

中文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CSSCI)
来源集刊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The Review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27

汪丁丁 主编

张静 吴肃然 焦长权

目标、关切和责任 —— 社会团体调查报告

曹正汉

“国有经济强国论”：历史考察与当代反思

李后建

官员历练、市场化改革与腐败治理

陈隆近

从福利经济学方法到政治经济学方法：
两代财政联邦主义文献述评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014056448

F0-53
114
V27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The Review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27

汪丁丁 主编



北航

C1741617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F0-53
114
V27



北航

C17416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第27卷 / 汪丁丁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7-208-12352-6

I. ①新… II. ①汪… III. ①政治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9306号

责任编辑 袁晓琳
装帧设计 荀冠虹



世纪文景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第27卷

汪丁丁 主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260,000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352-6/F.2244
定 价 50.00 元

新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变迁

——写给中国的作者与读者

汪丁丁

编者按语：这篇文章发表于《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06年创刊号，是编委会致作者与读者的信函。2014年5月10日，在上海，我们举行了跨学科编委会成立后的第一届编委会议。会后通览这篇文章，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需要更新的论点。不仅如此，这篇文章发表以来，中西学术界甚至没有在这篇文章指出的代数方法之运用方面取得任何值得关注的进展。第一届编委会讨论纪要表明，我们已确定了这份跨学科社会科学期刊的编辑方针并列出了核心议题的清单。据此，我们将实行轮值主编制度，从而主编可将更多时间用于稿件初审工作。

引言

我们创办这份《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目的是要发表那些试图在新政治经济学框架内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的学术论文与案例研究。为了符合这一目的，我们应当向投稿人解释：（1）在新政治经济学框架内提出的任何解释的若干特征；（2）中国社会变迁的若干特征。

如果把阿罗和布坎南视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创建了不同思路的创始人，那么，这门学科的基本解释框架——社会选择理论与立宪问题的公共选择视角，可以说形成于1950年代并受到1960年代的社会大动荡的极大刺激。然后，西方社会经历了大约三十年的动荡与变革时期。这些变革，在政治领域里最终让黑人和女性获得了与白人男性同样的选举权，在经济领域里确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和基于“福利国家”理念的税收制度，在文化领域里开拓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知识与意义的批判阵营。这样，当1990年代开始的时候，当初由阿罗和布坎南提出的新政治经济学主题已经被置于完全不同于1950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了。

与此同时，就新政治经济学论证的工具而言，博弈论和不动点存在性的数学证明的主要方法——代数拓扑，逐渐取代了由马歇尔和萨缪尔森引入经济学的最优解存在性的数学证明

的主要方法——数学分析。对于数学分析的应用而言,任何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数学表达都必须满足某种连续性假设。对于代数和拓扑的应用而言,任何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数学表达,只需要引入某种代数运算和拓扑结构,并以此为“代价”,取消往往过于苛刻的“连续性假设”。

基于连续性假设的数学分析,在马歇尔和萨缪尔森关于“个体理性选择”的研究中成为最具优势的工具。但当研究者的视野从个体理性选择的图景扩展到一切个体的理性选择的整体图景时,社会成员的行为的“结构”就成为无法回避的要素之一了。如果我们坚持使用理性选择的个体模型,那么几乎惟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各色各样的社会成员的个人选择集结为一个“好像是理性”的整体的选择行为。这就是所谓“集结的困难”,例如,宏观经济学解释框架内的集结行为往往看上去更像一位极端理性的中央计划者的行为。所以,哈耶克主张取消“宏观经济学”。

如果我们可以在定义“代数运算”时遇到的种种困难,我们往往能够对政治经济学问题进行代数的和拓扑的研究。后者的最大优势在于,我们不必把各色各样的个体选择集结为“看上去理性”的宏观选择。换句话说,借用社会学家的术语,我们可以直接研究政治经济行为的“结构”——偏好结构,产权结构,权力结构。

在上述背景下,当极端理性的“中央计划者”在现实世界里的典型终于在 1990 年代被大规模社会运动摧垮之后,我们被带入了所谓“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我们,主要处于“非西方社会”里的人类成员们,被带到这样一个韦伯命题面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仅见于西方社会而不见于非西方社会,因为它们都是西方理性传统的产物。

就“偏好”而言,我们不是西方理性传统的产物。那么,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的“理性选择”是可能的吗?我们的个体选择所能导致的社会选择是怎样的?我们的公共决策将以何种方式实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样一种思想努力:一方面,它主要借助于西方思想界已经获得的理论成果并且从我们自己的生存体悟中寻找具有本土意义的理念,另一方面,它提供了我们对未来中国社会制度的想象的基本框架。而在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大范围变迁的历史时期,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想象,又影响了未来中国社会制度的性质。

一、新政治经济学解释的若干特征

布坎南曾经以下列三个术语概括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1)方法论个人主义。方法

论的个人主义立场不否认“社会”对个体行为的塑型和决定性影响,它只打算为了研究的便利,先从个体行为出发,从一群个体的行为的交互作用出发,解释社会,只要这是一种可行的方法;(2) 契约关系。这当然是西方思想的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以卢梭和罗尔斯为其近代和当代的经典作家,把“社会”看作是一群理性个体让自己的行为遵守一套契约的结果。哈耶克对此提出过同样经典的批评,他指出,社会必须被视为自然秩序的演化的结果而非任何群体或个体的理性选择的结果;(3) 政治市场。这一假设当然是以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体制为原型的,它的提出者从未设想过要把它运用于“非西方社会”的政治过程。不过,在适当拓广其基本含义之后,尤其是适当拓广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假设之后,我们或许可以把非西方社会的政治过程看作一群理性个体在政治市场里竞争改善自己的福利的过程。

应当指出,布坎南概括的新政治经济学基本假设,规定了这门学科的“视角”——看问题的角度。这些假设不能规定这门学科必须处理的“基本矛盾”——由研究对象的内在特征决定的产生了一门学科的全部重要议题的一组相互冲突的原则。事实上,在一位新政治经济学家能够对任何社会现象提供任何解释之前,他已经看到了这一社会现象的各种可能解释所包含的内在冲突。一方面,这些内在冲突推动着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内在冲突,理论家无法向决策者提出确定不移的政策建议。

如上述,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但它要解释的是“社会”现象,是交互作用着的个体行为的均衡格局,并且这些均衡格局依赖于相互作用着的个体为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所赋予的不同意义以及这些意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导致了新政治经济学解释的一个最基本的内在冲突:一方面,方法论个人主义立场否定了不同个体的价值判断之间的可比性。另一方面,集体行动或公共选择毕竟有一些特定的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要求个体在不同个体的价值判断之间进行比较。

由阿罗和森分别提出的“不可能性定理”,以及追随他们的研究者们提出的许多不同版本的不可能性定理,都可以理解为是在各种不同假设下对上述内在冲突的刻画。另一方面,由哈贝马斯和布坎南等人倡导的“对话”原则,可以理解为是从公共选择的社会实践出发提出的缓解各种版本的“不可能性”的政策建议。

新政治经济学解释不可避免地包含的另一内在冲突是“演化”与“均衡”之间的冲突。在已经发表的文献里,我觉得,尚缺乏对这一冲突的详细解释。故而,下面的论述可以视为是对这一缺陷的某种补偿。

在“社会博弈”的理解框架内,我们知道,展开型博弈的经典分析方法,是假设每一社会成员从后向前推导其最优策略的。这一方法,在优化理论教科书里,就是所谓“最优化原理”。按照最优化原理,被优化的问题必须是封闭的,即存在一个有界的时间上限,目标函数——通常是决策主体的效用贴现值沿时间轴的积分,以这一有限时刻为积分上限。根据最优化原理,决策主体从这一时间上限,逆向寻求优化解——即决策主体从每一时刻到最后时刻的策略都是最优的,从最后时刻,一直推演到第一时刻。否则,如果存在一个最优解,它不满足上述最优化原理(必要条件),那么,按照最优化原理的数学证明方法,就可以建构一个解(策略),它在至少一个时刻比这一给定的最优解有更高的效用并且在一切其他时刻与这一给定的最优解等效用,于是这一给定的最优解就不可能是“最优的”。从这一反证方法可知,上述的逆向归纳法则其实是最优解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为什么数学家喜欢“最优化原理”这样一个必要条件,而不去寻找其他的必要条件呢?我觉得,最优化原理大概是最容易运用的一个必要条件。例如,我们经常要运用“庞特里雅金最大值原理”——最优化原理的一个变形,这时,我们几乎总是先从具体问题中推导出相应的庞特里雅金必要条件方程组,然后从满足这组必要条件的解当中寻找那些最优解——借助于所谓“二阶条件”,即充分条件判据。

最优化原理或逆向归纳法则,当系统不是沿时间轴封闭的时候,也就是当不存在一个有界的时间上限的时候,就不适用了。阿罗在研究资本理论时曾经证明过一个“近似条件”,很重要,这里不介绍。总之,当我们假设决策者的视野沿时间轴无限伸展出去的时候,我们无法应用逆向归纳法则。这时候,我们必须寻找其他的必要条件,或者充分必要条件,来求解优化问题。

另一类使最优化原理或逆向归纳法则失灵的情况,是当我们引进“不确定性”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可以再分为两类,其一是,例如,我们知道自己必定会死但不知道究竟会在哪一时刻死。这里出现了决策视野的时间上限的不确定性。但在许多情况下,存在一个足够大的时间上界,我们相信我们必定活不到那个上界,并且从那一上界做逆向归纳得到的最优解可以视为等价于上限不确定时的最优解。不确定性的第二种类型,不发生在时间上限里,而是以世界的可能状态来描述的,是所谓“事件”的不确定性。优化理论对此可以提出一些求解方法,例如,最初被引入金融学,后来在其他经济学领域也很时髦的所谓“随机过程优化理论”。但这一类最优解太难获得,也太复杂,缺乏直观意义。

面对这样的理论困境,一些博弈论学者提出“前瞻归纳”的分析方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所谓“烧掉底线”的囚徒困境博弈——这类博弈的可行策略之一是为强调合作意向而当众烧掉自己可以从“非合作解”得到的回报(一定数额的钞票,必须是可以燃烧的)。后者是博弈回报的底线,故而,这类策略可以叫做“烧掉底线”策略,它向博弈参与者们发出一个强烈信号,警告他们不要假设发信号者不打算合作。就我读到的文献而言,这类博弈究竟可否被纳入传统的博弈分析框架,是一个尚待回答的问题。

卡尔·波普尔曾经指出,制度应当不仅仅是一座城堡的图纸。因为空的城堡,如果没有适合守卫城堡的士兵与之匹配,就无法构成完整的“制度”。上述的前瞻性归纳的例子,已经包含了人的行为与行为规范之间匹配(或不匹配)的复杂性。

博弈参与者对自己的处于均衡策略中的行为的意义的理解,是可能发生“漂移”的。并且这种意义漂移的积累,足以导致均衡策略的漂移。于是,当采取了均衡策略的博弈参与者打算赋予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某种意义的时候,就会出现所谓“不确定性”。由于意义可能漂移,每一个博弈参与者都不可能再像以前还没有引入“意义”和“意义的均衡”那样确定地知道每一个参与者的均衡行为的意义。

借用我经常讨论的一个例子——“小姐”,这是一个中文名词。我们听到“小姐”的时候,需要判断当时的场合,从而可以判断说话的人是在“大家闺秀”的含义上使用这个名词呢?还是在“歌厅小姐”的含义上使用这个词?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包含了不确定意义的语言策略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十分普遍。

意义的不确定性,使任何“社会博弈”都具有了某种开放性,它等待着在博弈过程中进一步加以澄清和确定。由于意义的漂移,出现了多均衡的可能性。任一均衡,它的含义,或者它的核心含义,并不能被参与者们确切地知道。然后,当每一行为个体试图重新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也就是重新解释历史的时候,这些意义逐渐被澄清并且发生漂移。

重新解释历史,就意味着我要说服其他社会成员相信我所理解的历史才是正确理解的历史。在这一相互说服的过程达到某一“不动点”之前,在全体社会成员对历史的解释达到一个均衡以前,他们的行为对我而言就可以是不确定的,从而我就处于一个向着未来开放的历史过程之内。

这一内在冲突——均衡概念与演化概念的冲突,其实要求我们追求一种黑格尔说过的“逻辑与历史的同一”境界。只有在那样的境界里,才可能解释被观察到的人类行为和社会

现象。

在“客观博弈”的理解框架里,世界是静止的,永远不会演化。如果博弈的某一公认的“玩儿法”——即均衡,被大家知道并遵守了,那么这一均衡就永远存在下去,不会漂移,这个世界也就不会有变化。另一方面,为了容纳演化概念,诸如青木昌彦这样的作者,在最近若干年里,分别提出了不同于客观博弈的“主观博弈”理解框架。不过,这一思路遇到的关键性的困难是对博弈参与者们的“知识传统”的逻辑描述。这一困难,在本质上仍然是均衡与演化的冲突。

客观博弈可以被嵌入到主观博弈的理解框架里,假设每一博弈参与者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世界观。在这些主观世界之间,存在一个非空的交集。否则,博弈参与者们就彼此之间完全不可理解了。在人生经历和世界观的哪怕极小的重合部分的基础上,博弈参与者们可以建构一套“人类”语言,也就是共同语言。这套语言,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其中的每一个单词的含义,就都不会像上举例子中的语词“小姐”一样不确定。也就是说,出现了语词意义的某种均衡格局。又如果这些均衡是纳什均衡,即没有人愿意在非均衡意义上使用这套语言里的任何一个语词,那么,这套语言就可以用编写字典的方式来描述。也就是说,一旦实现了意义的均衡,这套语言就不会再演化了。因此,均衡策略——行为及其意义,也就不会再演化了。这或许就是海萨尼转换的实质——上帝替博弈参与者们掷了第一次骰子之后,其余的事情就是确定的。

但是,如果意义可能漂移,那么,原来是离散的纳什均衡的点集,就可能是一个连续统点集,例如,是一个连续统的实数集合,在这一集合内,均衡连续地漂移。这是否意味着均衡将丧失其基本的意义呢?均衡不再是均衡的了。这里,均衡概念包含了一个逻辑悖论。

均衡作为一个概念,当我们试图把它拓广到可以容纳演化过程时,就出现了上述的那种因意义漂移而来的逻辑悖论。事实上,任何社会现象,例如“制度”现象,都不再如新古典经济学家讨论的单纯的经济现象那样,可以被均衡概念所容纳。社会现象或制度现象,其本质特征就是演化。

但是,为了让理论具有某种实证性,也就是让命题具有可检验性,新政治经济学家不希望放弃“均衡”概念。均衡,这是社会科学的不可逾越的概念。一旦放弃了均衡概念,在理论的不可检验性之外,还发生了实践上的困难。如阿罗和洪在1970年代已经论证过的,非均衡的行为是不稳定的。行为的不稳定性,通常导致社会成员对相互行为的预期的不确定性,这被威廉姆森称为“行为不确定性”。当行为不确定性很高的时候,根据海纳在1980年代提出的

理论,任何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理性行为都不再是可调整的。换句话说,人类行为将演变为机械的,如同低等动物的行为那样,只能适应特定环境,不能适应更多变的环境。事实上,理论的实践价值就在于它为实践者提供了预期的工具。

均衡与演化,构成一种困境。它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即“知识论”的领域。语言的演化以及语言的逻辑问题,可以被包括在这一领域内。认知科学、演化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学科,在上面讨论的视角下,也可以被包括在这一领域内。

二、中国社会变迁的若干特征

如果上面的论述已经大致刻画了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那么,下面的论述可以充分显示出与中国社会实践所要求的理论能力相比,现有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能力是何等地渺小,尽管,它的分析能力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且它已经能够分析大大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围的现实问题。

1980年代后期,为了提供一个能够解释当代中国经济及社会现象的足够宽泛的理解框架,我在几篇论文里概括过中国社会变迁的三大特征:(1)中国经济是一个发展中经济。这一特征意味着中国社会面临着所谓“发展经济的根本问题”——怎样在两代人的时间内把由人口生育率转移和土地资源的有限性而发生的“过剩”劳动力转换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这是一切被称为“发展中”经济的社会都面临的问题,所以我称之为“根本问题”。关于“人口生育率转移”的经验研究及其普遍性,读者可以查阅任何一本人口学教科书。从发展经济的根本问题发生出来的派生问题,包括教育问题、传统农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问题。我们观察任何一个社会,可以很容易地根据这些派生问题的严重性来判断它的经济状况是“发展中”的还是“成熟”的。(2)中国政治体制是正在从传统的中央计划体制向未来的市场体制转型的某种体制。在这一转型期内,政府具有两种行为模式。其一是为旧的计划体制服务的政府行为模式,其二是为新的市场体制服务的政府行为模式。可是这样的政府就显得十分昂贵,因为它同时具有两种行为模式。例如,它的税收,同时为着两重目的——既要维持许多计划部门的开支,又要维持许多市场部门的开支。另一方面,这样的转型政治体制也导致严重的所谓“双轨制”腐败。金融和教育,这是最近若干年里凸显出来的腐败领域。在1980年代,腐败主要发生在国营商业与私营商业之间的灰色领域里。这样一个

政治转型期,如果我们采取类似上述关于经济转型期的态度,也来询问它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我自己的回答是,这一政治转型期的根本问题是怎样在大约三代人的时间内从既有的政治状态过渡到所谓“民主政治”的状态里去。关于“民主”的政治状态,读者可以查阅诸多政治学教科书,但这里,不同于上述的“人口生育率转移”的定义,读者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力,获得一个让自己感到满意的“民主”政治的定义。在多样化的关于民主政治的个人定义当中,我认为,有一些基本性质是可以达成共识的。这些基本性质之一,就是政府行为必须被置于全体公民(通过新闻和其他社会舆论)或其代理机构(包括各级代议机构)的监督之下,并且这类监督是遵守某种民主程序的,所谓“法治”的监督。从经验观察,我们不难判断,为市场服务的政府与民主政治体制,二者之间是匹配的。如果它们没有达成匹配,就会出现普遍的腐败。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上述的问题视为政治转型根本问题。(3) 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百多年以来,经历着一个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比前述两种转型远为复杂,这里,我们甚至难以确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传统”,以及什么是“现代”。不过,基于最粗浅的判断力,任何一个人人都可以直接感受到这种文化转型。而且,类似的文化转型也发生在日本和韩国,在它们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这些观察表明,文化的转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并且具有长期影响的社会转型。我建议读者阅读韦伯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经典论述,并且阅读文化学者(包括李泽厚先生和钱穆先生)和文化人类学者(包括本尼迪克特、吉尔兹和拉波波特)提出的关于“文化”的诸多定义,然后,观察自己周围的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法,概括出可以说服自己的中国文化模式。大致而言,我觉得,我们的文化转型可以概括为一个“在几百年时间内,从东亚传统的儒家文化向尚未形成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混合文化过渡的时期”。这里,我强调了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特征——全球资本主义,它在许多方面可以代表所谓“现代性”以及所谓“现代性危机”。只有在考察了传统与现代这两端的状况之后,我们才可能获得一些关于中国的文化转型期的深入看法。

今天,上述概括仍然适用。一般的人类行为,在这样概括了的转型期社会里,就格外表现出“短期性”。因为我们无法判断和预期未来的社会状况,我们的未来是极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的理性选择就是在各种可供选择的行为方案的集合里选择那些短期内可以产生最高回报的行为方案——包括被定义为“腐败”的各种行为方案。

不过,由于“市场社会”与“传统社会”并存,由于如上概括的转型期社会的三大特征,当代中国人的行为、思维和政策实施,就面临着许多更细致的实践问题,可按下列五类分别论

述——注意,第(1)、(2)、(5)这三类问题,读者可参阅我在其他文章里的更详细的论述:

(1) 教育。这是一个专业领域,教育学家关注的问题,不同于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对于前者,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教材内容(包括德与智之间的关系、中与西之间的关系、职业与基础之间的关系等等)和课程设置(包括教学、教法、教学技术和班级规模等等)诸方面的改革。对于后者,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教育产业化与教育机会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学术评价体制的改革,以及教育经济学诸问题。在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教育问题更多地呈现为公共选择问题——教育经费、学校管理、社区投票、学生自由择校,以及家庭教育和社会心理学等领域内与群体行为有密切关系的公共选择问题。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教育问题将逐渐从较低年龄组向较高年龄组转移。例如,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在职培训等方面的问题,将越来越凸显成为教育的主要问题。(2) 医疗。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随着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型过程的深化,与教育问题相比,医疗问题将凸显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在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医疗问题首先是公共选择问题——医疗费用在个人、企业、政府三方面的分摊方式,落实公平的手段如“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系”与落实效率的手段如“医疗服务产业化”以及医疗服务的“社区化”等手段之间的冲突与可行的解决方式,医患纠纷的监督和调解途径,医疗服务的质(成本)与量(覆盖范围)的权衡问题,公共资源在中医药研究开发与西医药研究开发之间的优化配置问题,医药专利审查与知识产权的适度保护问题,大规模疫病防治与疾病应急体系的改革等问题。(3) 土地。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这是一个其各种解决方案均严重地受到历史遗留问题影响的当代问题。如果它可以划分为农用土地和城市土地两类问题的话,那么,在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前者,即乡村土地问题,至少包括下列诸问题:土地的私人使用权与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之间的制度冲突与解决途径,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作为一种过渡形态的消亡方式,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作为一种永久形态的治理方式(包括“村民委员会”及各种基层民主程序的设计与实施),长期土地规划的权力结构及社区公共选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远比乡村土地问题复杂的是城市土地问题,在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它至少包括下列诸问题:公用事业类型与范围的更精确的法律界定,公众对城市管理权的监督方式,城市长期规划与市场自发活动之间的协调制度,市场导向的土地开发与公平导向的土地开发之间的协调制度,住宅分布与交通工具发展的市场决定与计划指导之间的协调制度,居民自由迁移的权利与不动产受保护和子女受教育等项权利之间的协调制度以及落实居民纳税义务与分享各项权利的制度安排中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的其他公共选择问题。

(4) 税收。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除了宏观经济学领域内的相关主题之外,在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它还应当包括由“梯伯特定理”引发的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自由移民相关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尤其是最近若干年重新受到学界重视的“俱乐部”理论的一般均衡和博弈论思路。就中国社会而言,随着经济与政治转型的深化,赋税的种类、负担、形式、法律合法性与道德合法性,这些问题将日益凸显为最重要的由税收问题引发的公共选择问题。并且,尤其在赋税研究中,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以布坎南为代表的新政治经济学家,通过与此有关的论述,可以告诉我们许多重要的道理。事实上,“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改革经验表明,在中国人必须向西方人学习的诸项事务当中,最艰难的,就是赋税。这一艰难过程,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学家关注的诸方面问题,而且涉及文化与政治学家关注的诸方面问题。有感于赋税问题之核心位置与艰难,希克斯甚至在《经济史理论》中断言,历史上一切中央集权的社会管理体制的瓦解,盖源于财政危机。另一方面,民主社会的财政制度,如布坎南在那部名著中论述的,也远非令人满意。长期无法缓解的美国财政赤字以及由此而来的“李嘉图效应”,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导致美国经济在 1970—1980 期间陷入衰退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用来说明民主社会面临的赋税问题之艰难的例子。(5) 环境。如果说,今天,在我们看来,利用市场机制解决“教育”和“医疗”这两大领域内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绩效并不令人满意,那么,早在 1950 年代,在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环境”就已经被视为是市场机制失灵的一个典型领域了。也因此,从环境与资源问题的研究中,经济学家积累了大量的市场失灵的案例。例如,被认为属于“可再生资源”的森林、鱼类、水、新鲜空气和土地肥力,在发达国家和在发展中国家,都提供了大量的案例研究。即便被视为是“不可再生资源”的矿产——包括石油和煤,其社会最优开采轨迹也极大地不同于在自由市场机制诱导下的利润最大化的开采轨迹。此外,在“南北贸易”问题的研究中,以齐齐尔尼斯基为首的一些学者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密集型出口结构可能对其经济发展带来极大损害。于是,经济资源的国际贸易就与国际平等和公共选择问题有了密切的关系。在资源经济学分析框架内,“环境”被理解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最后,我希望读者参阅我写过的一些学术文章(例如,“资源经济学若干前沿问题”),在那里,我批评了资源经济学传统的分析框架。事实上,我和我的合作者证明了在我们提出的新的分析框架内,一项资源,依赖于它的不同开采轨迹,可以从可再生的转化为可耗尽的,或者转化为周期性可开采的。在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中国社会面临的环境问题可以概括为下列三类:不同个体对环境的不同偏好的显示、效用比较和偏好的集结等问题,

环境的公共与私人产权的界定与实施问题,对环境的污染权的市场交易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协调问题。

结 语

尊敬的读者,为了参与和促进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创办了这样一份刊物,如今已出版了 27 期。在我们对这些尤其值得尊重和宝贵的作者表示我们的由衷感谢之后,我们意识到,由于未能事前对我们关注的研究领域提供足够详尽的说明,许多作者被误导到了我们不能关注和发表其作品的研究领域内。

有鉴于此,我代表编辑部撰写了这样一篇在我看来已经足够庞大的,并且希望它已经足够详尽的,我们所关注的研究领域的说明。

另外值得告知的是,自 2014 年始,我们设立了一个跨学科的编委会。2014 年 5 月,我们在第一次编委会上讨论通过了核心议题清单,因此我们将会在今后的若干期里着重关注以下主题:

收入分配

《21 世纪资本论》评议

国家权力与社会治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妇女问题

道德问题

自由主义的伦理承诺

身份焦虑与认同

城乡关系

国家治理结构

城市内部政治

中国过去百年与未来百年的转型

纪念贝克尔

在此次编委会之后,我们也首次举办了编委与读者的公开见面会,取名“理解中国”。在会上,我们从收入分配与制度公平入手,讨论与评说了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读者的热情与真诚出乎我们的意料,这足以让我们相信,这样一份专业领域的刊物,会辐射出专业研究之外的能量。

我们不能预期在这样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里、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发现和邀请足够多的高水平的作者。不过,我们认真地期许我们的读者:只要持之以恒,只要保持我们追求严肃学问的态度,我们的刊物和主办这份刊物的研究机构就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优秀作者。

所以,我们在这里告诉新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的每一位潜在的和认真的作者:放心地把你认为满意的作品投给我们吧!

编委人员

陈永发(香港中文大学)

程汉东(香港中文大学)

李俊承(香港中文大学)

陈国文(香港中文大学)

黄国光(香港中文大学)

李海建(香港中文大学)

周文彰(香港中文大学)

李海建(香港中文大学)

陈国文(香港中文大学)

李海建(香港中文大学)

李海建(香港中文大学)

李海建(香港中文大学)

目 录

1 新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变迁

——写给中国的作者与读者

汪丁丁

特稿

1 目标、关切和责任

——社会团体调查报告

张 静 吴肃然 焦长权

18 “国有经济强国论”：历史考察与当代反思

曹正汉

论文

38 官员历练、市场化改革与腐败治理

李后建

69 “宪政”形式的自治 vs. “无政府资本主义”形式的自治

朱海就

82 政治关联、机构投资者与投资效率

梁丽珍 孔东民

综述

104 从福利经济学方法到政治经济学方法：两代财政联邦主义文献述评

陈隆近

124 腐败行为研究的实验进路：一个综述

张新超 刘 璐 范良聪

学习与思考

145 制度主义的两副面孔：哈耶克与布坎南的制度范式的比较

汪毅霖 罗 影

170 税收竞争准则的演变及其对公共财政启示

张志鹏

Contents

- 1 New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ange of China's Society
——To Chinese Writers and Readers *Wang Dingding*

Feature

- 2 Goals, Concerns and Responsibilities: A Report of Social Groups
Zhang Jing, Wu Suran, Jiao Changquan
- 19 The Theory of Enhancing National Strength through State-owned
Economy: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Rethink *Cao Zhenghan*

Papers

- 39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Leaders, Marketization and Corruption
Governance *Li Houjian*
- 70 Self-Governance by Constitution vs. Self-Governance by Anarchical
Capitalism *Zhu Haijiu*
- 83 Political Connection, Institutional Investor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Liang Lizhen, Kong Dongmin

Summarisation

- 105 From the Welfare Economic Approach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A Survey of the Two Generations of Fiscal
Federalism *Chen Longjin*
- 125 Studying Corruption by Experiment: A Survey of Experimental Literatures
Zhang Xinchao, Liu Lu, Fan Liangcong

Learning and Thinking

- 146 Two Faces of Institutionalism: A Comparison between
Hayek and Buchanan on Institution Paradigm *Wang Yilin, Luo Ying*
- 171 Evolution of the Tax Competition Criterion and the Revelation
of Public Finances *Zhang Zhipeng*